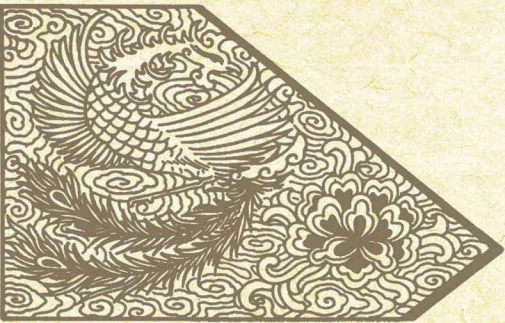




秦嘉徐淑诗文论稿

QINJIA XUSHU
SHIWENLUNGAO



常如冰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嘉、徐淑诗文论稿 / 常如冰著. —兰州: 甘肃
人民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226-04279-3

I. ① 秦… II. ① 常… III. ① 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中国—东汉时代②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东汉
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2480 号

责任编辑: 马海亮

装帧设计: 石 璞

秦嘉、徐淑诗文论稿

常如冰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3 字数 157 千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978-7-226-04279-3 定价: 25.00 元

序

一曲真事真情真意真感人的真爱之歌

——读常如冰《秦嘉、徐淑诗文论稿》

姚晓燕

一对少小相伴、相知相爱的男女，一对缠绵悱恻、恩爱至极的伴侣，一对灵魂高度契合的文友，一对生离死别的诗人，一对相思而亡的短寿夫妻……他们留下了《赠妇诗三首》《答夫诗》《述婚诗二首》《赠妇诗》《与妻书》《答夫书》《重报妻书》《誓与兄弟书》等一系列诗文。为此，故乡一位后辈为他们写出了《秦嘉、徐淑诗文论稿》。

《论稿》虽为学术著作，却于严谨的探究中透露着鲜活而强大的生命力。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情感既非简单加减乘除，更非千人一面的罗列。当代人理想主义光辉渐趋式微，以思想解放为幌子，以张扬个性、尊重隐私为借口，只在乎一朝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态度属于杯水主义。荣辱是非观念边缘化，操守蒙尘、绯闻迭出且不以为耻；权钱交易带来病态婚姻与爱情，世人不以为然，且深以为然。这就是当下社会爱情与婚姻现实之一斑。究其原因，在于这个时代对于真善美的宣传过于滞后。

年轻一代要持有怎样的爱情观去寻觅未来伴侣？要持有怎样的婚姻观来渡过共同生活道路？未来生活将以何为荣、以何为美、以何为善、以何为真？《秦嘉、徐淑诗文论稿》可以成为弥补这一方面缺憾的补天之石。

跟着作者的思路阅读本书，会对这对夫妻生出无限钦佩。远在汉代，秦嘉就以大情大义诠释了爱情的真谛；同样，徐淑那超越时空的爱情观也让人惊叹不已。“男权社会，对男子的放纵和不加约束的合理化与对女子的极端禁锢的事实，使得很少会有男女双方对等的婚姻关系。”秦嘉则不然，对婚姻充满敬畏和感恩，“纷彼婚姻，祸福之由。”“从《述婚诗》中对婚姻那种近乎陶醉的满意，到四言《赠妇诗》中的离别伤神，再到五言《赠妇诗三首》中远别而不得叙旧的痛楚，他所钟情和反复吟咏的主题对象只有一个，这就是他的妻子徐淑！当被委以重任、良机降临时，秦嘉不但不以此为乐，反而将其看成是‘不能养志’、‘趋走风尘’，‘非志所慕’，且‘惨惨少乐’。他把妻子不但看成是和自己对等的一个人，而且看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种精神寄托”。当不能见到心爱的妻子时，“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孩子气般的怨言里倾诉着深深眷恋、忠贞之情：“尔不是居，帷帐何施？尔不是照，华烛何为？”遂送上明镜、宝钗、好香、素琴，以表相思之情和关怀之意。

徐淑，更是不同凡响。她是一个最懂夫君的妻子，对丈夫的差使不满意，认为委屈了秦嘉，但却加以安慰和鼓励：“知屈珪璋，应奉岁使，策名王府，观国之光，虽失高素皓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当身患疾病时，为减轻丈夫负担，使其专心于公务，她

主动回家养病；夫君送来好礼，她回信婉诉衷情：“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侍帷帐，则芳香不发也。”表达了对丈夫的爱恋之情和忠贞之心。“诗文中的满腔痴情，远涉千里亲往津乡亭扶嘉灵柩以归的悲情，兄弟逼其改嫁时的决绝态度，对徐淑这种近乎激进的行为只能说明一点：她对丈夫是挚爱的，心中唯有秦嘉一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她于苦苦相思中发出了“身非形影，何得动而辄俱；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的浩叹！两地分居影响感情，但夫妻毕竟不可能整日形影不离，就连比目鱼的两只眼睛也不可能一直相依相偎，何况是人类呢？独立！自尊！自强！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徐淑，发出了与《致橡树》一致的声音，这该是天下女子何等自豪的真爱呐喊！她敏感而清醒，不为世俗羁绊，不为感情束缚，表达了一个成熟知识女性对待爱情的正确态度。她的自白，像一支古老而又清新的歌曲，拨动着后人心弦。她独立而自强的呼声，实际上是对夫妻人身依附关系的否定，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没有这种独立人格，怎能赢得秦嘉对她的无比尊重与爱恋？

这对夫妻，用短暂而丰盈的生命践行了纯真、热烈、坚贞、独立的夫妻之爱。爱情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是生命的原动力，是生命激情的交响曲，是美好灵魂的炽热独白。真诚、高尚的爱情，建立在各自独立人格的前提之上。这种爱，无比地厚重、博大，哪怕病魔施虐，哪怕千山相隔。这对夫妻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双方远远超越了肌肤之亲而臻于神交。他们独立、平等、相互尊重，共同承担人生重负，共享生活的甘苦荣辱；他们热情而坦诚地讴歌美满幸福的感情生活；他们忠贞不渝，比肩而立，以真爱回报彼此。

任何时代，爱情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最复杂微妙的关系，总受着文明发展程度的制约，受着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伦理诸种因素的影响。女性地位长期低下，由此积淀了卑微孱弱的心理意识。时至今日，由于权势或财富或观念作祟，双方最初以感情而结合，结果总变成主导和从属、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往往出现主人和奴仆、统治和受制的关系，导致夫妻感情本质异化，从而失去了爱的本质，或软弱依附，或恃强凌弱，佳偶成为怨配，这中间，除了上述因素，失却独立与自尊自强，却是主因。如今社会出现的种种畸形男女关系与乱象，不正是对真爱的反衬吗？

因为推崇夫妻之义、之恩，作者对两位古人幸福婚姻的解读准确到位，深刻透彻。精确的解读背后，是作者对于主人公忧患意识的真切理解：“为什么人的生命会如此脆弱？！”“在遽然远离而又前途未卜的关键时期，当面对难获面别这一残酷现实时，诗人遂不由得发出‘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的人生慨叹；而徐淑的《答夫诗》更是自始至终充满时不我待，荣华难再的情绪，充满着‘悠悠兮离别’的无可奈何的哀叹。”“从这组赠答诗和往还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生命意识是多么强烈，其哀世惜时的情绪又是多么浓重！与其说他们的喜怒哀乐都缘于夫妻离别，倒不如说缘于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因此而生发的生命忧患意识。”“诗人将自己的大不幸置于人间无数个体的人生际遇之下，既伤自己，又叹如己之人。所以，这一慨叹顿然间就有了分量，内蕴也变得深沉而有力，也使得全诗格调陡升！”

精到的见解背后，是作者对于主人公真事真情的赞赏：“若将秦嘉、徐淑的这一真实小事情放在他们真实的悲剧人生中来考察，

就不难理解诗人所感所知无不饱含挚情，念时则慨叹‘忧艰常早至’，‘省书’则‘情凄怆’，‘临食’则‘不能饭’，‘长夜’则伏枕辗转不能眠，看到‘浮云’，则悲激于胸……真实的事情在诗中演绎，真实的情感在句中流淌，他们之间的私人小事传达的是笃厚的感情，彰显的是他们对婚姻的忠贞，他们所坚守的忠贞是人间的根本正道，他们遭遇的生离和死别是人间最大的悲剧，他们经历了人世间普遍存在着、而在他们身上表现尤甚的离合悲欢。正因为流露出的是这种自然的真情，所以一旦发出就能够引起人的共鸣，读来自然感人至深。”《论稿》中，此类精辟解读还有很多。

《论稿》中，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顽强而执着的探索精神。作者追根朔源，实地调查，探访，考查，寻觅，对于秦嘉与徐淑姓名之来历，故里之争，生卒年月及死因，官职，仕途，安葬之地，性格等诸多谜团，做了锲而不舍的追索；依重典籍，却不为其束缚，对于种种模糊不清的观点和说法，有着独特而坚定的立场观点，解析疑难鞭辟入里，毫不含糊；敢于质疑前辈，毫不盲从。全稿结构恢宏严谨却不失精巧，典籍纷繁却脉落分明，推理缜密精准。文稿内容包涵众多且头绪繁杂，犹如层峦叠嶂，却写得丝丝入扣，游刃有余，从容镇定，显示出作者在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天文、礼俗等方面丰富而饱满、深厚而全面的诸般诸类学养与极深功力。作品语言老辣，字斟句酌，全不似青年口吻；冷静理智的阐述、逻辑严密的推理，生动贴切的理解，使得枯燥的学术研究在笔下显得盎然多趣，意境隽永；作者对于文字的运用造诣极高，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主人公由衷尊重与崇高赞美，把最真挚、最美好的内在感情倾注笔端，融入论稿，更将个人人格之真与艺术之美统一为一体。

关于《论稿》，作者多次表示对于两位古人特别是有关徐淑的资料太少，这也是读者特别想知道的。在此，诚挚地祝愿 27 岁的作者，把希望留给不久的将来。在此，以作者为荣，并分享和多次引用他的著作。

是为序。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001·····	第一章	秦嘉、徐淑的生平
002·····	第一节	秦嘉、徐淑故里考略
010·····	第二节	秦嘉的生卒年月
015·····	第三节	秦嘉死因辨析
023·····	第四节	秦嘉、徐淑事迹略述
030·····	第二章	秦嘉、徐淑的存世诗文及研究概况
031·····	第一节	秦嘉、徐淑的存世诗文
032·····	第二节	秦嘉、徐淑及其诗文研究概况
040·····	第三章	《赠妇诗三首》真伪及创作年限
041·····	第一节	《赠妇诗三首》真伪辨析
058·····	第二节	《赠妇诗三首》的创作年限
061·····	第四章	秦嘉的四言诗及徐淑的骚体诗
062·····	第一节	秦嘉的三首四言诗
070·····	第二节	徐淑的《答夫诗》
074·····	第五章	秦嘉、徐淑诗歌的艺术特点
075·····	第一节	秦嘉、徐淑诗歌中的用典
079·····	第二节	秦嘉诗中对偶的运用
084·····	第三节	秦嘉、徐淑诗歌的语言特色
090·····	第六章	秦嘉、徐淑往还书及《誓与兄弟书》
091·····	第一节	秦嘉、徐淑往还书的版本

094·····	第二节	秦嘉、徐淑往还书概论
99·····	第三节	徐淑的《答夫书》
102·····	第四节	徐淑的《誓与兄弟书》
106·····	第七章	秦嘉、徐淑诗文的思想感情
107·····	第一节	秦嘉、徐淑诗文中的生命忧虑意识
112·····	第二节	秦嘉、徐淑诗文中的情感力量
120·····	第八章	秦嘉、徐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21·····	第一节	《赠妇诗三首》是研究文人五言诗的“活化石”
130·····	第二节	《赠妇诗三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140·····	第三节	开赠答诗先河
143·····	第四节	古今第一夫妻诗人
164·····	附录	秦嘉、徐淑诗文校注
189·····		参考文献
194·····		跋
198·····		后记

第一章

秦嘉、徐淑的生平

第一节

秦嘉、徐淑故里考略

中国古代著名夫妻诗人秦嘉、徐淑是东汉汉阳郡平襄县、今甘肃省通渭县人。此是定论。但历来文献因袭前说，辗转相因，以讹传讹，频频出错。南朝徐陵（507年—583年）《玉台新咏》（卷一）所载秦嘉五言《赠妇诗三首》小序云：“秦嘉，字士会，陇西（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陇西’有两层含义：一是泛指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二是特指‘陇西郡’。由下句‘郡上掾’可知，此‘陇西’乃‘陇西郡’之意。《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之‘陇西’与《后汉书·董卓传》：‘董卓，字颖川，陇西临洮人也’之‘陇西’亦皆为‘陇西郡’之意）人也，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清严可均（1762—1843）《铁桥漫稿·后汉秦嘉妻徐淑传》、闻人倓《古诗笺》、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南北朝诗》、吕德申《诗品校释》、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辞海》（1989年版）、《通渭县志》（1990年版）等诸多文献皆从徐陵说。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六十六载秦嘉《与妻徐淑书》及《重报妻书》注谓秦嘉“桓帝时，仕郡”。而据陈守忠《通渭建置沿革考》（《通渭县志·重要文献辑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秦昭

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秦国在西北建置了陇西、北地，上邽三郡……汉初陇西郡辖第九县为平襄县（今通渭地）……至武帝元鼎三年（前 114 年），从陇西郡分置天水郡，辖县十六，平襄为附廓首县……明帝永平十七年（74 年），天水郡更名为汉阳郡。”可知秦嘉、徐淑籍贯为汉阳郡平襄县，而非陇西郡。后人之所以一直称其为陇西郡人，或许与今通渭地在很长时期内为陇西郡（治所狄道，即今甘肃省临洮县）所辖有关。

秦嘉、徐淑故里在今通渭县的什么地方呢？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以历代《通渭县志》为代表，认为秦嘉故里在今什川乡秦家坪，徐淑故里在今榜罗镇桃园村；一种以何钰先生为代表，认为秦嘉、徐淑故里均在今通渭县城区。

据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1613 年—1616 年）《重修通渭县志》载：“汉秦嘉……今城川铺（按：即今通渭县什川乡）东，是其故里。”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人物》（卷十一）载：“汉秦嘉……今城川铺（同上）东，是其故里。”同书卷二载：秦嘉之墓在今“榜罗镇（按：即今通渭县榜罗镇）秦家坪”。光绪十九年《通渭县新志·人物》（卷六十四）载：“汉秦嘉……今什川镇（按：即今通渭县什川乡）秦家坪即其故里。”《通渭县志·人物传·秦嘉和徐淑》（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载：“秦嘉故里在今什川乡大湾村秦家坪。徐淑故里据传在今榜罗乡桃园村徐家窑。”同文又载：徐淑死后，“族人和乡邻十分同情，遂与其夫合葬于今榜罗乡岔口村岔口社秦家坪”。

何钰在《东汉诗人秦嘉与徐淑夫妻故里在今通渭县城区考析》

（《定西日报》2009年12月27日）一文中，依据清乾隆《巩昌府志·人物》和光绪《甘肃新志》有关“汉秦嘉……渭城人”的记载认为，秦嘉与徐淑夫妻故里均在今通渭县城区。何文认为，一直以来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嘉故里在今通渭县什川乡”，其根本原因是，明清以来的人把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修筑于擦珠谷（今通渭县什川乡古城沟北李家坪）的通渭寨误作是废于十六国西秦时的西汉平襄故城。但事实上，“渭城”是“明清文人对通渭的雅称”，而废于十六国西秦时的西汉平襄故城就在今通渭县城区。所以，“秦嘉与徐淑夫妻故里在今通渭县城区”。

上述第一种说法有两点疑问：

第一、秦嘉既然是今什川乡人，在礼法森严的古代，为何不埋葬故里而葬在今榜罗镇岔口村秦家坪？按照历代志书记载，秦嘉为今什川乡人，1990年版《通渭县志》说徐淑故里在今榜罗乡桃园村，而这两个地方均与今榜罗镇岔口村秦家坪搭不上边，那么1990年版《通渭县志》有关“族人和乡邻”将其葬于今榜罗乡岔口村秦家坪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呢？这里另有隐情还是记载有误？

第二、梳理几条材料，明万历《重修通渭县志》、清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和光绪十九年《通渭县新志》有关“汉秦嘉……今城川铺东（秦家坪）是其故里”的说法与秦嘉之墓在“榜罗镇秦家坪”的记载很有琢磨之处，居然生在今什川乡的秦家坪，葬在今榜罗镇的秦家坪，两个秦家坪，一个在榜罗镇，一个在什川乡，且均与秦嘉的生死攸关，这纯粹是偶然还是巧合？

对于上述第二种说法也有几点疑问：

其一，何文是以《巩昌府志·人物》和光绪《甘肃新志》中“渭

城”二字为突破口得出结论的，因此，弄清“渭城”一词至关重要。何文的解释是：“渭城”是“明清文人对通渭的雅称”。也就是说，“渭城”代表的是整个通渭县，而非仅指今通渭县城区。那么清乾隆《巩昌府志·人物》和光绪《甘肃新志》有关“汉秦嘉……渭城人”的记载只是说明秦嘉、徐淑是通渭人，并未说明是通渭哪个具体地方的人。但何文分明是把“渭城”当做通渭县城的代称了。其实，“渭城”一词是有多重含义的。据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地理志》载：乾隆十三年前通渭县“原编户一十六里”，其中有一里名为“渭城”，大概位置就在今通渭县什川乡一带。而何文中提到的通渭历史文化名人李南晖因其为通渭县城人，故自署“渭城李南晖”之“渭城”应指的是通渭县城。所以上述两个“渭城”，意义迥异。

其二，何文认为，“此说的错误来源和关键所在是将宋城当作了汉城所致”。并引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卷二有关“汉城川古城在县西八十里，依山为城，其地名曰古城沟，据城川铺东十里，即秦嘉故里焉”的记载，从而指出，这是把筑于北宋神宗熙宁元年的通渭寨误作是废于十六国西秦时的西汉平襄故城。但是何文对这一条的引用并不完整，完整的记载是：“汉城川古城在县西八十里，依山为城，四面皆险阻，即古渭州；今遗址尚在，名其地曰古城沟；据城川铺东十里，即秦嘉故里焉。”很显然，这里的记载不但搞错了时间，还搞错了空间。撰志者其实是把通渭寨既当成了“汉城”又当成了“古渭州城”，而非何文仅指的汉平襄故城。历史上的“渭州”有“古”“新”之别，北魏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始置渭州（按：是为古渭州），治所襄武。唐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的陇西、安定、漳县、渭源、武山等县区。安史之乱后其地属于吐蕃，宣宗大

中时仍归唐。唐中和四年（公元 884 年）渭州（按：是为新渭州）移置平凉（今甘肃平凉）。北宋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省的平凉、华亭、崇信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泾源等县地。金改为平凉府。事实上，同是乾隆志书的《巩昌府志》犯了与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类似的错误，即把通渭寨故城既当成了汉代平襄城又当成了古渭州城。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如同有人将通渭县城简称为“渭城”一样，将古渭州城简称为“渭城”也是合乎情理的。上文所引乾隆《通渭县志》记载的乾隆十三年前通渭县“原编户一十六里”中，“渭城里”的命名，正是明清时期的人将通渭寨误当成古渭州城的一个例证。所以，清乾隆《巩昌府志》和光绪《甘肃新志》有关“汉秦嘉……渭城人”的记载中的“渭城”，并非如何文所说的：“‘渭城’是明清文人对通渭的雅称”，而是在把通渭寨当成古渭州城的错误观念下对古渭州城的“雅称”。当然，这种错误观念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元和郡县志》陇右道渭州：“襄武县，本汉旧县也，属陇西郡……武德元年改属渭州。”据《水经注》卷十七：“渭水又东南，径襄武县东北，荆头川水入鄆，水出襄武西南鸟鼠山荆谷，东北径襄武县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据考证，古渭州治所襄武县位于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距离通渭寨较近。因了这层地缘关系，后人、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人将筑于北宋神宗熙宁元年的通渭寨误认为古渭州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源头上讲，“通渭”一词的由来的确与古渭州有密切关系。据陈守忠先生考证，通渭寨修成后，朝廷赐名“通渭”，即通往古渭州的意思（见《通渭建置沿革考》）。古渭州与通渭寨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至于明代弘治年间通渭知县张二南《平襄怀古》一诗中

误把“宋城”当做“汉城”的问题，只能看成是诗人诗言，不足为据。

既然对上述两种说法都有可推敲之处，那么秦嘉、徐淑故里究竟在今通渭县的什么地方呢？

据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卷二“古迹”条载：“汉秦公之墓，讳嘉，墓在榜罗镇秦家坪。近有伍姓人耕田掘得墓志碑，仍覆于其中。”言其“近”者，必是距修志不远的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记载应该是可靠的。由此，伍姓人耕田掘得秦嘉墓志碑的记载则成了寻找秦嘉故里最为可靠的一个线索。虽然文献中并没有记载这个“伍姓人”是哪里人，但是，这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讲，找到这个伍姓人所在地也就等于找到了秦嘉故里。因为在礼法森严的古代，人死后除特殊情况外必然是葬于故里的（这一问题后面还要详细论述）。因此，秦嘉故里的范围事实上缩小在了通渭县“伍姓人”生活的区域。查1990年版和2010年版《通渭县志》伍姓人口，据1982年统计，计59户，凡333人；据2005年统计，凡490人。在通渭县属于人口少且居住相对集中的姓氏，具有可调查性。笔者调查得知，通渭县现有伍姓人主要分布在榜罗镇的文丰村、积麻村以及常河镇的南山村孙家山社和南河村伍家山社。今通渭伍姓人同出一祖，祖籍安徽，后迁至今陇西县，一部分又徙至今通渭县榜罗镇，其中一房迁至常河镇南山村孙家山社及南河村伍家山社（人口较少），一房迁至榜罗镇积麻村，两房留在榜罗镇文丰村。可见，通渭伍姓人主要生活在县西南的榜罗镇一带。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榜罗镇调查时意外得知，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在今榜罗镇岔口村秦家坪（与榜罗镇镇政府所在地的